

近读录

纸上聊天

止庵

二自一月起管我一部分费用，担任若干尚未说明。贤媳经济情形亦深悉，希冀的现状，每月能筹出若干寄我转付家用，再行核夺可也。”按这里所说的“一月”当指次年即一九三九年一月。然而再看宋琳1937年10月21日致许广平：“八道湾太师母月费仍照常送来，约每月来探视一次，二先生因学校停止，颇受影响。”则周作人按月供给母亲生活的时间，较之鲁瑞所说为早。似乎鲁瑞有一段时间对于许广平未据实相告，只因许广平听了李霁野的建议直接给周作人写了信，她才说起二儿子即将付钱。而作为许广平代理人的李霁野有一段时间也不明真相。而宋琳与周家关系更为密切，对西三条的情况要熟悉得多。这种一手材料，显然比譬如俞芳等人后来所写的回忆可靠一些。当然如果能与李霁野核实一下，或许就更为稳妥。不过上面提到的两本书虽然出版在李霁野生前，我找出来对照着读却已是在他去世之后了。关于鲁迅的回忆堪称“汗牛充栋”，多关乎事业与思想方面，对日常生活却讲得很不够，他的生平留有空白，有些虽知一二但不能坐实，上面说的即为一例。说实话，凭借现有的那些材料，还不够为鲁迅写一本实实在在的传记。

《约台随笔》中《一片晚秋的风叶落了》一篇中说：“我与李霁野先生聊天的内容，除了他感兴趣的国内外大事及当前热门话题，就是与鲁迅有关的人和事了。例如关于鲁迅与朱安夫人的关系，我曾告诉李先生，坊间有本专谈鲁迅、许广平、朱安三人感情纠葛的书。作者说，有一次朱安为鲁迅缝制了一条新棉裤，放在鲁迅的床上，满指望他能穿上，但鲁迅却把它扔出门外，使朱安非常伤心。李先生斩钉截铁地说，鲁迅绝不可能这样做，鲁迅对朱安虽然没有爱情，但平常相敬如宾，对她的态度还是好的。李先生每次去鲁迅家，都是朱安出来端茶送水，从未见到鲁迅对朱安有什么不尊重的表现。有一次，李先生与台静农、韦素园三人去鲁迅家，临别时鲁迅对他们说：‘明天你们三人来我家吃晚饭。’当时他们听了有点奇怪，但第二天还是按时赴约了。鲁迅说：今天是我的生日，邀你们来热闹热闹，妻子特意做了家乡口味的酥鸡，让你们尝尝。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鲁迅的家里还是有一种夫妻和睦的气氛的。李先生曾几次跟我说，他想专门就此写篇短文，以澄清这种不实的误传。”按“扔棉裤”一事，见于孙伏园《哭鲁迅先生》（1936年11月《潇湘杂志》第二卷第八期）：“一天我听周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下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老太太认为我的话有时还能邀老师的信任，所以让我劝劝他。鲁迅先生给我答复却是不平庸的：‘一个独身的生涯，决不能常住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蓆或棕蓆，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是以李霁野的相关质疑，未必确当；然而他所补充的关于鲁迅与朱安关系的回忆，假如属实的话，自可以与此并存。”并“存”至少比那种单凭印象（其实是人云亦云）得出的简单化、片面化的判断，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我与林谷先生久未见面，又不常通音问，不免如闲聊天地拉杂说了很多，就此打住。这本书印得很好，假如提点意见，就是大概是出版社给配的那些图实在可有可无，达不到与文“并茂”，然此亦一己之见而已。

汪曾祺在一篇回忆西南联大同学的散文中说：“西南联大的‘几个研究生被人称为‘无錫学派’，无錫学派即钱锺书学派，其特点是学贯中西，博闻强记”（《未竟才——故人偶记》）。“钱锺书研究”已成“显学”，但素无“钱锺书学派”之说。此说是一条重要的现代学术史的史料，可见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学术影响。当时的钱锺书还是刚刚留学归国直接任职西南联大的年轻教授，并且仅仅工作一年即离职，他的学术著作《谈艺录》和小说《围城》、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等的出版，还是1945年以后的事情，那么这种巨大的学术影响因何而来？这实在耐人寻味，亦可谓现代学术之“传奇”。此前，类似的“传奇”，仅有20年代陈寅恪应聘清华大学及其巨大的学术声望。

汪曾祺一再赞同钱锺书的著名的“打通”说。《作家应当是通人》开头即云：“钱锺书先生说他在中西文学方面所做的工作不是‘比较’，而是‘打通’。我很欣赏‘打通’说。”整个20世纪，文学研究真正能够“打通”中西者，朱光潜、钱锺书之外，还有何人？今日“比较文学”研究，“打通”者几无，不通者众。反倒是文学创作，大家、名家者，鲁迅、如堂以下，大都中西“打通”。汪曾祺当然在“打通”者之列。在这篇文章中，汪曾祺立论创作应该“打通”，对钱锺书的“打通”之说，作了独到的发挥：不仅“中西文学的打

张政烺先生生前称我老人家“张伯伯”。他与我父亲胡厚宣先生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同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事，最后又同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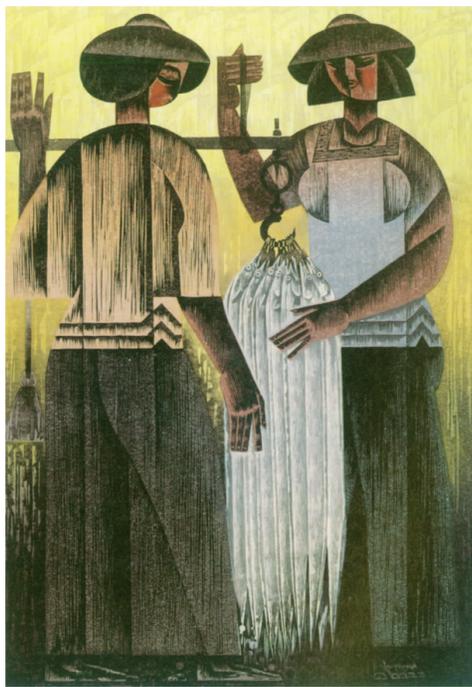
现在我个人所见张伯伯与我父亲最早的一幅合影，是在1937年5月18日史语所南迁时在长沙“中国艺术史学会”成立当天所摄。照片中有我父亲在北大的老师马叔平先生，在史语所的老师徐中舒、梁思永先生，前辈朱希祖、胡小石，友人商锡永、滕固、常任侠，张伯伯也在其中。“艺术史学会”概由滕固发起，早先，我父亲曾写有一篇“全国第二次美展”《中央研究院殷墟出土展品参观记》，收入滕固编的《中国艺术论丛》，而张伯伯藏书中亦有一册滕氏所译《史学考古学方法论》。

张伯伯有一幅照片，摄于南京鸡鸣寺史语所楼前，丁梧梓先生站在其后。1998年5月振宇赴台参加“甲骨文百年会”，其间曾往石璋如先生办公室，因为石伯伯母校河南大学百年庆典，拟由振宇写一《石璋如先生与商代文化研究》（后刊于《史学月刊》1999年第1期），把初稿请他过目，顺便我也向石伯伯询问有无早年照片，因为殷墟发掘之时，石先生专门负责照相。待我离开史语所时，石伯伯交我数张照片，其中一张背后注明是我父，但我却看照片中人极似丁声树先生。回京后，我拿着这张照片去协和医院看望张伯伯，顺便请他老人家帮忙辨认，那时张伯伯便能言语，却只是瞪大眼睛专注地看了半天，若有所思，未发一言。

张伯伯晚年时常与我父亲共同出席各项活动，有时我也陪同一道，这期间曾聆听许多张伯伯的高论。因为两位老人是自青年时就相识，所以无话不谈，张伯伯也不拿我当外人，对许多事物的

多年前我在韩国济州岛一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这所大学远离市区，校园很大，林木茂盛，环境非常清幽。老师、学生一般不住校，下课后返回市内，偌大的校园人迹寥寥，更显幽静。学校建在郊外的山坡上，旁边就是济州岛也是韩国的最高峰汉拿山，学校外则是封闭了的自然保护区，里面杂草丛生，沟壑纵横、杳无人迹，堪称鸟兽的乐园。我住的教授公寓楼在半山坡上，往下是一条悠长的林荫道，四季风景如画，经常可以看到远道而来的新郎、新娘来此拍婚纱照。

校园里面的视野极为开阔，丘陵起伏，树木茂密，教学楼掩映其中，颇有情调。学校在教区之外还专门辟有一片山坡园林，供师生游玩，休憩。园林区山路弯弯，曲径通幽，沿途设有欧式



笔会

大海无量
(水印木刻)
陈波

回忆张政烺先生

胡振宇



看法、人物的评价，自己的经历，以至戏剧时尚等等，都有涉及，且句句大实话。振宇今日还能回想起张伯伯谈话时的语调神态及动作手法。

1994年初，在台北的史语所召开“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研讨会”，特邀所中在大陆的前辈张伯伯及我父亲两位。而振宇获准陪同前往，在我们刚抵台北机场时，前来迎接的史语所管所长就特别转达两位的老友陈槃庵先生之邀。当我们前往陈公馆探访时，陈先生已不能言，概由陈夫人代为转达，张伯

伯见到老朋友，还趋前说道：还认得不认得？其间又问起陈先生的家乡老弟的情景。陈先生精心准备了礼物。送给我父亲的是他的名著《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疏异》、《不见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国考稿》，送给张伯伯的是亲作的诗（陈先生早年在所中就有“诗人”之称）。临行时史语所方答应可帮邮寄获赠的书籍，张伯伯还一再叮嘱，内中有珍贵的诗作。不知陈先生硬笔书写的诗作今日是否尚在。

近年来，我在整理父亲的著作时，

也翻检出数封父亲保存的张伯伯来信。文如其人，字里行间显露出张伯伯的性格，如说乙编下辑，“此书中有用之材料不多，颇使人失望，反不如续存”。读到《殷墟发掘》，称“看到许多金文拓片，尤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但“可惜图排一排版误倒，为美中不足”。真的像傅斯年先生说的，是“最critical”的。

张伯伯的书法，是他自认为得意的，他也同我说过，认定“书法家”，启动可以给出证明的话语。我也曾想讨一幅墨宝，张伯伯总是笑着说：我们是自己人，回去再说。但回家后，又各忙各的，终究没有下文了。张伯伯的著作中，写甲骨的不多见，我个人也仅见三幅，北大文研院正在举办的“张政烺先生学行展”展品中得见第四幅。美国已故吉德炜教授有一幅，是1987年安阳殷商史上所，挂在他的家中。相同内容的范觐周也有一幅。其中有“我来学习”的字句，我想这也是我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目的。

照片说明：1937年“中国艺术史学会”成立当天，马衡（左12）、徐中舒（左17）、梁思永（左9）、朱希祖（左8）、胡小石（左10）、商承祚（左6）、滕固（左3）、常任侠（左2）、张政烺（左11）、胡厚宣（左7）等合影。

济州岛的野趣

耿传明

的仿古路灯，一路走去，如入世外桃源，美不胜收。刚到学校，我与一位同事去园中散步，没走多远，他居然在路旁的树荫下，捡到了一个碗口大、紫红色的野生灵芝，他喜出望外。灵芝又称林中灵、琼珍，是中国古代象征祥瑞的仙草，在中医里具有补气安神、延年益寿的功效。野生的灵芝不太多见，他能

在路边捡到灵芝，说明此地的幽僻、静谧，自然生态保持极好。

我到济州岛不久，就进入了深秋时节，同事拉我到海边的一个酒馆就餐。这个酒馆建在深入海中的栈桥之上，正值黄昏，海边风大浪高，波涛汹涌，巨浪强劲地拍打在岸边深黑色的火山岩柱之上，激起一人多高的浪花，颇有一种摄人魂魄的古古气象。济州岛的海产品丰富，我们那次聚餐主要吃的是生鱼片，此前我从未吃过生肉，有一定的心理障碍，但蘸着芥末汁尝了一点之后，感觉还不错，并无明显腥味，有一种淡淡的清香。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电影《秋刀鱼之味》，流露出的也正是这种清淡、隽永的味道，它所展现的是未经加工、朴素自然的生活本色。

济州岛的地貌很独特，它是120万年前火山活动而形成的岛屿，由火山喷发而形成。它的地质结构由堆积岩层、玄武岩、火山暗流及因火山活动而形成的火山碎屑岩等构成，属于典型的熔岩洞窟地形。济州岛上的火山石多为深黑色，上面布满蜂窝状的气孔，拿起来很轻，可以把它加工成搓澡石来用，常见街上的商店将它作为旅游纪念品出售。济州岛有自己独特的民俗文化，他们崇拜的神叫多尔哈鲁那，又叫石头爷爷，岛上到处可见他的石像。

济州岛最著名的景点应该是汉拿山，汉拿山意为“能拿下银河的高山”，如果不爬汉拿山，便枉来了济州岛，与中国“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意思相近。到济州岛不久，我在朋友的带领下，专门去爬了一次汉拿山。爬山之前，我们先下山去古代祭祀山神的祭坛去看了一下，祭坛很简朴，就是一个石制的香炉，只是两侧有数棵高耸入云的参天古松，特别引人注目。就像王安石诗中所

咏的古松那样：“森森直干百余寻，高入青冥不附林。万壑风生夜响，千山月照挂秋阴。岂因壤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自侵。”此地的古松也自有一种“自得天机自生成”的恢弘、雄奇之气。古松以“铁衣生涩紫鳞干”的矫矫千岁之姿，仍然“昂霄舞翠”，的确令人肃然起敬。李白的《拟古》诗中“蟠蛇啼青松，安见此树老”以及“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的诗句，表达的也正是这种由古松所唤起的人对永恒的宇宙之道和人生的终极意义的追问。

看完祭坛，我们开始去登顶汉拿山。汉拿山主峰海拔高度为1,950米，与中国的华山、五台山等相比都低一些，但爬起来颇为不易，因为最大程度保留了山的原始面貌，没有为方便游客登山而过度开发，如砌台阶、建缆车之类。上山的路很狭窄、陡峭，有时连台阶也没有，只能手足并用地上去。登顶汉拿山虽然辛苦，但也确实让登山者体会到了乐趣。

居韩一年，我的重要收获是得到了一次难得的与自然亲密接触、乃至完全融入其中的机会。有一些记忆深刻的场景至今难以忘却——如初春时节，黑黝黝的樱树枝丫上突然开出粉红色的硕大、艳丽的花朵，仿佛一夜之间由冬天迈入到了春天，校园内外，十里花海，芬芳馥郁，徜徉其中，令人醉而忘返。再如寂静的静寂中，突然听到室外山涧里清脆响亮的蛙鸣，令人精神一振，仿佛触摸到了宇宙自身生命的律动，南宋张九成诗句“春天月夜一声蛙，撞破乾坤共一家”，大概写的正是这样一种境界。夏日一夜电闪雷鸣之后，小溪暴涨，成为湍流，冲击岸边的野草，如同野人头上披拂的长发。秋日雨后，林荫道上落满了金黄色的树叶，一眼望去，仿佛是一条黄金长廊。冬日午后，在室外窗台上撒开小米，很快就会招来山雀啄食，顿感生机盎然。人的心灵是不能离开这种来自大自然的滋养的，它能使人活得更像个人，而不是个机器。

2017年10月22日天津

汪曾祺与钱锺书

高恒文

通”，而且“古典文学和当代创作之间的打通”，乃至“古典文学、当代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的打通”。此说极是，亦可谓夫子自道。就汪曾祺的创作而言，或许我们应该补上第四个“打通”：小说、散文、诗、戏剧和绘画之间的“打通”。

虽然也可以说两人都是小说家，但艺术风格却是截然不同的；汪曾祺明言“对我影响较深的有契诃夫、阿佐林、伍尔夫和纪德”，“我的小说明显地受到西方现代派影响”（《寻根》）；钱锺书的小说则与英国的奥斯汀、萨克雷诸人的作品近似。然而借用《管锥编》论《老子》所谓异类相通、相反相成之说来看，他们的小说，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即小说中的“发议论”的问题。

汪曾祺反对在小说中“发议论”，强调“倾向性不要特别地说出”（《小说笔谈》）。恰恰相反，我们知道，《围城》的特殊之处，就是随处可见的“发议论”！不仅叙述者大发“麻将当然算国技”、“老科学家”与“老”的

“科学”之类的议论，而且人物也爱“发议论”，诸如“局部的真理”、“熟食铺子”等等，最著名的关于婚姻是“金丝鸟笼”还是“围城”。

不过汪曾祺还说：“我并不一般地反对在小说里发议论，但议论必须很富于机智。带有讽刺性的小说常有议论，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说短》）《围城》不就是讽刺小说吗？《围城》中的议论正是以“机智”著名！诗人、散文家余光中说：“小说家钱锺书往往不甘隐身幕后，忍不住会从旁指指点点，像是说书人。说书人太有个性，太有趣了，就算他借题发挥，暂时把故事搁在一边，我们也乐得姑妄听之，因为太好听了”；“《围城》最好听的部分是每章的起头跟其后穿插呼应的夹叙夹议。其议并非正规的讲理，而是富于理趣甚至情趣的”（《新儒林外史——悦读钱锺书的文学创作》）。此说可窥钱锺书的特殊之处，就是随处可见的“发议论”！不仅叙述者大发“麻将当然算国技”、“老科学家”与“老”的

氏一向惯于挥霍。长的因字生字，因句生句，风行水上，自然成纹，乃是学富才高的自然产品。此往就成了可以独立观赏的小品文”。此乃“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谓也欤？

汪曾祺十分重视语言。他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思想与语言》）在《“揉面”——谈语言》一文中，他说：“有的语言，如果知道它的来历，便会产生联想，使这一句话有更丰富的意义。”中国古典诗论，自黄庭坚论诗有“无一字无来历”之说以后，出处、来历就成了主要命题。但是，论小说的语言而有“来历”之说，汪曾祺第一人、首倡。《围城》中的议论，旁征博引，充满典故，语言也常常是有来历、出处的，这是引起注意的特征；《槐聚杂存》中的作品，语言的出处、来历是重要艺术特征；而《谈艺录》开篇总论“诗分唐宋”之后的第二则即为“黄山诗补注”，是此著的几则笔记中的篇幅最长的一则，这不仅为钱

锺书重视黄诗，也表明了钱锺书对黄诗的出处、来历这一艺术特征的重视。钱锺书的诗，受宋诗尤其黄庭坚诗的影响，是很大的。然而他在《宋诗选注》中，却不得不严厉批评黄庭坚诗和江西诗派的注重出处、来历，称为“形式主义”。尽管我们知道，他的这种批评，固然是因为迫于时势，但还是巧妙的修辞技巧，皮里阳秋，否定的只是讲究出处、来历的弊习，并未完全否定这一艺术技巧本身，并且主要是拿江西诗派的末流开刀，相反却对黄庭坚以及苏轼、王安石等人的佳作，不措篇幅，特意指出某一句、某一联的出处、来历；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之一末句“时有归牛浮鼻过”是有来历的，并且是“点铁成金”；《书湖阴先生壁》最后两句“这是比较健康的‘用事’的例子”，符合中国古典修辞学对于“用事”最高的要求：“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汪曾祺论“来历”时还说：“我们许多的语言，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从前人的语言中脱胎而出的。如果平日留心，积学有素，就会如有源之水，触处成文。”前一句近乎“若胸臆语也”之意，后一句强调“积学有素”，是和黄庭坚的思想一致的。

关于汪曾祺与钱锺书，可说的还有几点，比如“老嫗都解”、黄庭坚书法等等，兹不赘述。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